

海外视野

栏目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郭英剑

美法院:哈佛并未歧视亚裔学生

■郭英剑



近日,针对亚裔团体控告哈佛大学,美波士顿地方法院作出判决:哈佛的招生制度虽不完善,但并未歧视亚裔学生。判决结果一出,迅疾登上 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再度引发社会各界对该问题的深入讨论。

制度虽不完善,但并未歧视

10月1日,针对此前亚裔团体对哈佛在招生过程中歧视亚裔学生的指控,美国麻州波士顿地区一家法院法官巴罗斯(Allison Burroughs)做出裁决,尽管哈佛的招生程序并非完美无瑕,但并不存在歧视亚裔学生的现象。这样的裁决无疑是支持了哈佛的立场,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这个亚裔团体对哈佛提出指控始于2014年。2018年6月,这家名为“要求招生公平学生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的非营利机构,向波士顿地区的一家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声称该组织在对超过16万学生的记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控告哈佛大学在评价亚裔申请者时,对其个性特点予以较低的评价,这些个性特点包括人的积极人格、可爱度、勇气、善良以及是否广受人尊敬等。而且,哈佛对亚裔学生的低估与歧视亚裔的行为是长期的,一以贯之。该组织提出,哈佛的招生过程不仅违反,还违反联邦人权法,故意歧视亚裔申请者,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该案件经过一年多的审理,到如今在地方法院有了明确的结果。巴罗斯法官所给出的裁决意见书长达130页。

简言之,巴罗斯法官主要表达了三个观点:第一,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说,哈佛的录取计划满足了严格审查的要求,符合宪法的要求。第二,该招生制度并不完美,但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任何歧视性的故意或有意识的偏见。她不会因为需要做得更好就取消一个符合宪法规定的良好的招生程序。第三,带有种族意识的录取制度有其长处所在,在

社会上也深受重视,可以为高校校园提供多元化的氛围,并使师生之间学习相互尊重与理解。

众所周知,上半年美国媒体所曝光的名人和富人父母贿赂体育教练、伪造学生记录,帮助他们进入顶尖大学的招生丑闻一出,震惊全美。随后,全美各大高校都在检视与审查各自的招生制度。此次哈佛裁决亮相可谓恰逢其时,引发全美关注自在情理之中。

由于该亚裔组织早在去年就声称,他们的目的是要将该案件推向最高法院,因此,如果不出意外,这起备受美国社会各界关注的案件,很快会被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

看点在多样性,重点却在《平权法案》

哈佛方面的律师威廉·李(William Lee)在一份声明中说,巴罗斯法官的裁决代表的不仅是哈佛,也是所有追求多样性和法治建设的重大胜利。这意味着法院也承认,人们不该在多样性和机遇公平上开历史倒车。

哈佛大学校长巴科(Lawrence Bacow)在致全校的邮件中说,将种族(race)问题以及其他因素纳入考虑范围,有助于我们达到建立多样化的学生群体的预期目标,进而能够丰富学生所接受的大学教育。他说,“美国高等教育的力量就源于从我们的差异中相互学习,而实现这一承诺将使我们的大学和社会更加强大。”

虽然控辩双方涉及的焦点大都围绕多样性展开,但事实上,人们都很清楚,这起案件所针对的重点,其实还是自从出台就带有争议的《平权法案》

(Affirmative Action)。单就最基本的立场而言,哈佛所依据的是《平权法案》;而“要求招生公平学生组织”则反对该法案,所依据的则是《1964年民权法案》。

《平权法案》最早出现在1961年3月6日,是由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签署的行政命令,目的是为了照顾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所谓《平权法案》,是指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法律上要给予任何人平等的机会,目的是为了防止在“肤色、宗教、性别或种族”等问题上对有关人员,特别是少数族裔人员带来歧视。为此,要确保公共机构如高校、医院和军队中的平权措施,从而使所有人都能够得到平等对待。为了贯彻这样的平权法案,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美国很多高校都采取了种族配额、性别配额的措施,从而推动了校园多样性与多元化的向前发展。

所谓《1964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是美国在民权和劳动法上的标志性立法进程,它宣布了因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或来源国而有的歧视性行为均为非法。这一法案禁止公民投票中的不平等待遇以及在学校、工作场所和公共空间中的种族隔离。该法案于1964年7月2日生效。

“要求招生公平学生组织”援引《1964年民权法案》第六章提出了四项主张,认为哈佛非法提高了对亚裔美国人的水准要求,这种要求要远高于其他种族的学生;哈佛追求种族平衡,目的是保持种族群体的百分比大致相同;哈佛不把种族作为单一的“加分项”,而是作为接纳的决定性特征;最后,哈佛绕

开了种族中立的选择以实现校园的多样性。

哈佛大学对此的辩称是,哈佛每年申请者大约在4万人左右,但能够通过选拔进入哈佛的人数,每年不过1600人左右。如果不采取种族平权措施,那么在全校6700名学生规模中,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学生的人数将减少大约1000名。

虽然说这起案件的看点在多样性,重点在《平权法案》,但问题的根本则在教育公平。自从柏拉图提出教育公平思想以来,亚里士多德提出要通过法律保证自由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孔子也提出过“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后世的人们都在竭力寻求教育公平,然而,在现实中还是遇到了相当多的问题。正如此案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如果根据平权法,需要照顾少数族裔者,这就让部分非少数族裔者(包括少数族裔中的强者)的利益受到影响。换言之,如果照顾弱势群体,那么非弱势群体利益如何保障?像这样的问题或许难解甚至无解,但确是人类社会所必须要面对的。到最后,人们或许还是需要借助法律的制度保障,找出一条中间道路来。

亚裔团体输了

此次裁决显然有利于哈佛,但亚裔组织与亚裔群体并未感到有太多的失望。原因有二。一是原本他们就不指望在地方法院获得支持。将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然后由最高法院来裁决《平权法案》的是是非非,才是其目的所在。二是巴罗斯法官的意见书虽然支持哈佛大学,但也对哈佛的一些

制度与措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提出了批评。

比如,巴罗斯认为,虽然哈佛不会有意或故意歧视亚裔美国人,但是,学校还可以而且也应该在对亚裔美国人的问题上做得更好(尽管并不是要通过消除《平权法案》来实现)。

再比如,巴罗斯也表示,如果哈佛能够防止隐性偏见,使用明确准则,密切监视与种族相关的统计差异,那么,哈佛的录取过程定将大受裨益。

更加关键的是,在裁决中,巴罗斯强调提出,白人和亚裔美国人个人评级(personal ratings)之间的差异尚未得到充分和令人满意的解释。而我们知道,个人评级后所得到的分数是哈佛用来对申请人的勇气、友善和友善品质进行评分的指标依据。而该亚裔团体发现,恰恰是在这个分数上,哈佛大学几乎是系统性地给亚裔美国申请者下降了等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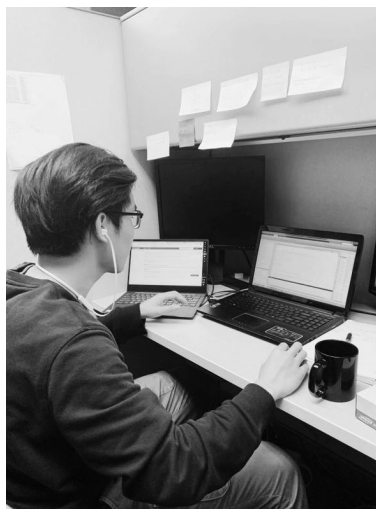
从这个方面说,亚裔团体也得到了他们所要得到的一个公平的认知与舆论支持。对于很多亚裔美国人来说,打这场官司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取消《平权法案》,毕竟该法案是美国长期以来受宪法保护的一项政策,对于推进教育多样性的目标产生了巨大影响,亚裔美国人也是受益者。然而,从现在开始就要反对人们心目中无意识、有意识、内化或强化地对亚裔美国人的种种偏见,则时不我待。

虽然说这起历时一年有余的案件暂时有了倾向于哈佛的结果,与哈佛面临同样问题与质疑的精英大学也都暂时松了口气,但事情还远未结束。这起案件走入美国最高法院时,一场更加艰巨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四海游学

勾勒科研的模样

■霍南



霍南在耶鲁大学PET研究中心实验室进行代码调试。

项目,因为我在本科时参与的几个研究项目都是信号处理在医学上的应用,因此也十分渴望能在国际顶尖学府参与相关方向的研究。

在经历了提交简历、学院推荐、耶鲁面试等选拔环节后,我幸运地争取到了这次赴耶鲁大学完成毕业设计的机会。

这次宝贵的经历让我在体验完整科研过程、培养良好科研习惯的同时,也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一次难忘的科研历程

通常在做PET扫描时,心脏信号是通过外加心电图设备(ECG)获取的,但这样会占用额外资源。目前学术界提出了基于元数据,即列表模式数据(Listmode data)产生的分布质心(Centroid of Distribution, COD)数据驱动的门控技术来提取心脏信号,其优势在于不需要借助额外的硬件来获取心脏信号。而我们的研究目的是优化基于元数据的心脏门控方法来提升其鲁棒性。

初到实验室时,我们暂时缺乏相关背景知识和对领域内相关概念的了解,给自身“充电”是当务之急。于是,导师卢一兔博士就为我们精心挑选了一些论文,让大家补充基础知识并学习之前领域内提出的方法。

在学习期间,我们也被邀请参加组会。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在组会上,导师在与其他科研人员讨论方法的时候也会询问我们的想法。当我提出一种现在看来非常幼稚的方案时,导师非但没有觉得我在浪费时间,反而夸赞了我的想法,并且认真地解释为什么该方法不可行。这让我感觉到国际顶尖的实验室并非遥不可及,反而是那么真实温暖。

充分地分析项目内容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由于我的项目是一个优化问题,导师首先和我讨论之前提出的方法有哪些改进空间,分别针对这些方面应用不同的优化方法。

在提出优化方法后,需要研究方法的性能表现,这就需要将整个过程的代码实现。在这一过程中,我学到了非常重要的方法——模块

化,然后再分别实现。这就好像事先准备好所有零件,最后拼成一个完整的乐高玩具。始终对科研抱有一颗赤子之心的导师曾说:“乐高是孩子们的玩具,而科研项目是科研人员的热爱的事业,这每天早8点都会准时来到实验室开始工作,几乎每次都会工作到晚上11点以后才回家,在比较忙的时候工作到凌晨也很正常。但他不会因为工作到很晚而影响第二天的工作,他的自律让我敬佩。”

而实验室主任、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理查德·卡森教授更是热爱与自律的典范。

我还记得当他在组会上向我们介绍曾经发表过的某篇很有影响力的论文时,脸上洋溢着自豪和喜悦,就好像一位父亲在向大家介绍他出色的孩子,他眼睛里闪烁的光芒告诉我们他是真的热爱科研。说起自律他更是到了一种极高的境界。导师曾和我们提到过卡森教授每天早晨5点就起床,健身一小时,吃过早饭7点之前准时到实验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更加令人惊叹的是,他每天都会跟进实验室里数十个不同领域的项目进度,还总能在组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各个项目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令人茅塞顿开的建议。我想正是他一直以来对科研的热爱和自律造就了一代学术泰斗。

正是在耶鲁大学的这一段经历,让我学到了很多,也养成了很多好习惯,比如完成任务之后进行细致的自查、在项目过程中坚持写日志文件、对研究项目形成物理上的感知,等等。这些都是让我受益终身的财富,也让我能够更快、更好地适应研究生项目的新学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生活,在寻找指导老师的时能够自信地说,我已经养成了这些良好的科研习惯。我相信有了本次耶鲁大学毕业设计积淀,我以后在学术道路上能走得更远。衷心地感谢南京邮电大学贝尔英才学院让我拥有这个宝贵的成长机会。

（作者系南京邮电大学贝尔英才学院毕业生）

科研的热爱与自律

耶鲁大学PET研究中心最让我敬佩与感动的地方在于,每位研究人员对于科研的热爱,以及他们共

“一带一路”高校行动

梳理调查印媒“一带一路”新闻1048篇,总计字符数400余万;组建跨学科团队,融合专业优势,深入分析印度国内六大主流英文媒体;采取计算机词云分析、情感分析、语料库搭配检索等方法,探索计算机辅助大规模媒体话语研究范式……

在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有一支这样的团队,他们研究印媒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情感,进而引导国内受众理性看待外媒涉华报道。

调查分析1048篇印媒新闻

“我们借助CiteSpace文献梳理工具,检索了近五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一带一路’话语研究文献,一共获得文献481篇。”“印度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情感变化及原因对策分析”项目申报人、南通大学英语162班张明慧说。

他们对文献关键词进行分析后发现,近五年“一带一路”话语研究主要聚焦话语体系、国际话语权、国家形象、国际传播、主流媒体话语建构等议题,多采取批评话语分析、评价理论、框架理论等,重点关注西方媒体、海外华文媒体、东南亚媒体等新闻媒体。

随后,项目组进一步聚焦“一带一路”媒体话语研究文献,发现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播学和语言学领域,涉及两类内容:一是对国内媒体“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话语的研究;二是对国外媒体“一带一路”新闻语篇的分析。

“我们发现对印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媒体话语研究数量少。仅有的几篇研究多为基于《印度时报》等单一媒体10—20篇小规模新闻语料的定性分析。所以我们尝试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项目组成员、南通大学翻译161班葛志安说。

于是,项目组检索了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印度时报》《印度斯坦报》《印度教徒报》《经济时报》《印度电报》《新印度快报》等印度六大主流英文媒体的报道,筛选出1048篇“一带一路”新闻语料,并进行系统调查和分析处理。

张明慧表示,他们遵循文献梳理—语料检索—理论分析—定量统计—定性分析—对策建议的技术路线,把1048篇新闻报道的英文标题翻译成中文,再进行情感分析,考查印媒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是积极、消极,还是中立,同时对优兔(YouTube)等网站相关话题的受众评论进行收集、分析。“这样的分析下,能够客观呈现出印媒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情感变化趋势。”

梯队接力组建跨学科团队

你怎么看待、翻译“一带一路”?你们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有什么样

的期待? ……

结论的获得,不仅得益于项目组对大量新闻报道的分析,还离不开事实的佐证,为此,10多名项目组成员走访了21名来华印度留学生,并对他们进行了细致访谈。

人们也许不知,这个项目组最初只有一人。该课题发源于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2018届毕业生钱琳霞在校期间的申报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当时,评审专家认为这个项目很大,一个学生研究不完。于是,他们就考虑把研究范围缩小,形成学生梯队不断接力的形式,一步步逐渐完善。

两年多来,这支队伍从一个人发展成为由11人组成的大团队,逐渐从青涩走向成熟。“最开始的大创项目全是人工翻译、人工分析,最初的语料也只有200多条,规模大、效率低,最终只能止步于省赛。”指导老师王雪玉说。

如今,大规模数据的处理仍旧使人发愁。一次偶然的机会,王雪玉从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挖”来一宝——软件工程专业学生陈天翼。“天翼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让我们团队如虎添翼。有了他的技术支持,我们的工作量少了整整一半!”指导老师刘道影说。

今年夏天,新加入的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刘楷阳又为团队注入经济视角。指导教师王媛媛表示,刘楷阳主要负责分析印度主流媒体关于经济方面的言论,“他甚至比我们更加专业”。

打破了专业藩篱,英语专业学生负责文本分析、情感标注和新闻标题的翻译工作,公共管理专业学生负责经济话语分析,软件工程专业学生提供技术支持,在调查分析的过程中,项目组将1048篇印媒新闻语料录入系统,总计字符数400余万,建设了国内大规模历时性印媒“一带一路”新闻语料库。

“该项目研究成果可为我国外宣部门‘一带一路’传播提供参考和借鉴,也为国内高校留学生课程建设提供建议。”教育部首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施旭对该项目予以高度评价,他甚为惊讶于这样的成果竟然由本科生团队完成的。

做「一带一路」的「新闻眼」

■本报记者温才妃 通讯员周瑾 穆丹妮